

# 版本學上幾個有待研究的課題

昌彼得

版本學是研究版刻的鑒別與歷史及書本源流的一門學問。我國圖書之開始有雕版，到現在至少有一千二百年的歷史，而版本之成為一項專門學問，使得人來研究它，還不過是近五六十年的事。我國印刷術肇始於唐代，歷宋元兩朝，雕版印書已經非常的普遍，但還談不上有版本之學。到了明代，版本學才漸漸萌芽，入清以後方始昌盛，雖然有講版本的書，還沒有研究版本學的專門著作。因為前人都是依據他豐富的收藏來比勘考校，完全憑他的經驗來鑒定及撰述。至於其所以然之故，大抵是心領神會，未嘗明白的寫出來以教示於人，所以還沒有步入科學的領域。清宣統三年葉德輝撰成了書林清話十卷，是我國第一部研究版本的專著。在這部書中對我國雕版的起源及歷代公私刻書的情形，書林的掌故，都有相當詳細的考述。民國以來，又經過中外學者不斷的研討，才奠定了版本學的基礎。版本學上的知識，我們所知道的，比起清代的人，固然要豐富得多。但終究歷史還淺，有許多問題，還有待我們來繼續研究。現在我且提出幾個比較重要的課題來商榷，以供有興趣的同道來共同研討。

清孫從添藏書紀要說：「夫藏書而不知鑒別，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及濟之，徒為識者所笑，甚無謂也。如某書係何朝何地著作？刻於何時？何人翻刻？何人抄錄？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為宋元刻本？刻於南北朝何時何地？如何為宋元精舊鈔本？必須眼力精熟，考究確切」。誠如孫氏所說的，鑒別是研究版本的一個基本手段。假如我們不能鑒別，不僅是為識者所笑而已，而我們所獲得的知識即不可靠。我國版本鑒別之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始於明代末葉。在

兩宋人的筆記中，以及宋元的目錄書中，雖偶然提到監刻、及蜀、閩本之有不同，或列載當時流傳的版本，但這只是文字校勘上有所區別。前人刻書，都有序跋或牌記，敘述刻書的原委及記載雕版的年代地域，只要一加翻閱，就可以知道該書是何時何地何人所刻印的，所以在宋元兩朝沒有鑒別版本的問題發生。明代中葉以後，民間覆刻宋版的風氣很盛，一般的收藏家也都珍視宋版。像嘉靖時江陰朱大韶不惜用所寵愛的美妾向人掉換一部宋版漢書。萬曆時蘇州王世貞賣了一個田莊，僅為了收購一套宋版前後漢書。明末常熟的毛子晉，甚至出高價徵求，在大門口貼告白說：有拿宋版來賣的，計葉付錢。所以當時民間流傳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的諺語。入清以後，錢牧齋、季滄葦等復倡之於前，乾嘉時黃芻圃、吳兔牀等人更推波逐瀾於後，於是有佞宋、寶宋的名稱出現。不僅寶宋，而且珍元。降及清季，藏書之家罕有不以所藏宋元本來炫耀於人的，而他們的身價也全憑所藏的多寡來定高下。然而宋元刻本，歷時幾百年，屢經兵燹水火蟲蠹之災，傳世的究屬有限。徵求的既多，販鬻的自然無以為供，於是坊估遂不惜偽造來欺騙購藏者，以獲暴利。據明萬曆年間高濂燕聞清賞錄、屠隆考槃餘事等書的記載，當時坊估作偽的方法，已經千奇百怪。愈後作偽的技術也愈進步，不僅用元充宋，明刻充宋元，甚至有拿清代覆本來冒充宋本的。只要蓄一入書估之手，無論是宋元原刻或明清覆本，鮮不改頭換面。原有的序跋牌記往往被折除，移真綴假，以假作真，以致面目全非。明清兩代的藏書家重視宋元，固然是使得許多的孤本秘笈，得以復出老屋，重顯於世。也促成了我國舊本書的混淆不清，增加了後世鑒別의 困難。

為了避免遭受書估的欺騙，清代的藏書家提出了幾個鑒別的原則。他們鑒別的方法，不外是從書刻的字體、版式、行款、紙張、諱字等五項來觀察。書刻的字體，固然是各時代各有其特殊的風格，

然而欲精於此，非多見真本，了悟其風神，則不足以言鑒別。若但執着顏、柳、歐、趙諸體字來區別宋元，則未免失之泥。如遇虎賁中郎，更真贋莫辨了。何況清人區分宋元字體，僅憑其經驗，並非經過比較研究後所得的結論。至於版式行款，各朝代並無一定的規格。而且後代覆刻的版式行款與原本無異，實難以作為鑒別的根據。從紙張來鑒別，不失為一比較科學的方法，因為各時代各地域製造紙的技術及原料成分各有不同。但清人僅靠經驗用手觸摸來鑒定，並非作紙的化學分析，所以並不完全可靠。而且即令像西洋一樣，作紙的化學分析其成份，或用放射元素來測定其年代，對於我國的雕版書也並不完全適用。因為西洋印書用活字版，僅印一次，印畢後版即撤除，不像我國的雕版所需要的部數後，版尚可貯存，歷時數十年乃至數百年，還有需用時，仍可隨時印刷。故刷印的時代雖有早晚的不同，而其版則一。譬如南宋初年所刻的南北朝七史書版，在明初還相當完整，我們不能因它用明代的紙所印成，而否認它是宋版。從避諱字來鑒定宋刻，雖是比較可靠的一種方法，但若遇書中沒有見到宋朝皇帝的諱嫌字，或私家坊刻避諱不謹嚴，甚至不避諱，或明代覆本也照避諱，則就無法鑒別。綜觀清代的藏書家所提供的幾種鑒別方法，對於版本的研究，雖然頗有貢獻，但終究不是完全可靠的方法。姑不論那些方法無法鑒別出某書刻於何時何地，就是用來斷定為宋為元，也往往有錯誤。觀清代各家藏書志著錄的所謂宋元版，其中即不乏贋品。雖以清內府收藏之富，翰林侍從諸臣賞鑑力之高，在天祿琳琅書目所載的宋元版，就有不少是元充宋，或明清刻本以偽宋元的，更可見鑒別的不易了。

民國以來，藏書家的鑒賞力比較清人又有進步，一則是受西洋印刷術傳入我國的影響，宋元舊本用西法影印流傳及攝編書影的衆多，聞見上比前人要廣些。再者是在清人鑒別方法以外又知道利用雕

版刻工來作考訂。原來在宋元本版心的下方，往往記有刻工的姓名。刻工在他們所雕的版片中心私自簽刻下姓名，不過是為了便於統計各人所刻版片的數量來計算工資用的。版心有刻工在宋元本中除了少數坊間刻本以外，頗為普遍。清代的學者雖已注意到刻工，但只認為是宋版書的特徵之一，罕有利用來作考訂的。近四五十年來學者始注意及此，往往從刻工來考訂版刻的時代。因為古代印刷雕字工匠是一種專業，凡公私有雕印書的，多僱募這些專門技術雕刻工來從事。故在同一時代與一地區雕版的許多書，它們的刻工往往相同。所以從刻工不僅可以考訂出書刻的時代，甚至於可以考出雕版的地域。故近代所編撰的書志，如寶禮堂宋本書錄、文祿堂訪書記等書，對於所著錄宋元版的刻工，都有詳細的記載，以供稽考。

刻工的確是版本鑒定上一項重要的參考資料，我們若要整理我國的宋元舊本，改正前人鑒定的錯誤，考出那些失去刻書序跋牌記宋元本的刻時刻地，也只有先從刻工的研究入手不可。只是一書的刻工少則數人，多以百計，而現存的宋元本數量也不算少，查考起來非常困難費時。三十多年前日本長澤規矩也曾根據我國故宮博物院、及日本靜嘉堂、宮內省圖書寮、金澤文庫、足利學校等機構所收藏的宋元本刻工，編了一個索引，名為「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登載於書誌學第二卷第二、四兩期，我國鄧衍林將之譯載於圖書館學季刊第八卷第三期。這篇刻工名表是依姓氏的筆劃為序，下注所見的書號。從某一刻工可以查檢出他曾刻過了那些書，在那些書中只要有一部存有原來的序跋，知道它的刊刻年代及地方，就可以類考出凡有該刻工的書為何時何地所刊雕。雖然長澤氏所採用的宋本僅一百一十餘種，元本六十餘種，數量不多，原來所鑒定的版本，有的也難免有點問題，但他的這項工作的確給予人的方便不少，值得贊揚。我覺得像這樣的刻工表極值得我們有志研究版本學的來重編。近

幾十年來宋元本經過影印的很多，而私家的藏書也大都收歸公有，很容易見到，不像在私人手中，爲禁秘藏，不輕示人。而近代所編著的題記書志也大都詳載刻工，所以我們所能見到的資料，比長澤氏的時代不知要豐富多少倍。這個刻工表編成後，可以便於查考，但還只是研究版本的初步基礎，我們可以再進而甄別整理，來比較研究各時代各地域書刻的字體及版式，歸納出一個法則，才能技得上是科學的鑒別方法，再來考訂那些沒有刻工的宋元版，如此可以真僞立辨。到那時，書估作僞的技倆都無所遁形了。

印刷術是我國發明，這是中外學者所無異辭的。但發明於什麼時候，則歷史上沒有記載。我國現存最早的雕印品，是英國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石室所發現的唐懿宗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王玠刻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現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這卷佛經雕印的相當精美，可以推知必需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演進到那種技術。現今存世最早的印刷品却是日本稱德天皇時代所印的百萬塔陀羅尼咒。稱德天皇在天平寶字八年（西元七六四）討平惠美押勝之亂後，爲了酬謝佛恩，乃發宏願，下令造三重小塔一百萬基，廣印陀羅尼咒，在每一塔內放置一卷，一直到她崩的那一年——神護景雲四年（西元七七〇）才畢工。在第八世紀時代，正是日本親感吸收我國文化的時代，那時的京都奈良完全模倣唐都長安的格式來建造。稱德天皇時代主持印刷百萬塔陀羅尼咒的是東宮學士吉備真備，吉備曾在我國長安留學十九年，他的建議用印刷來代替抄寫，顯然是受我國的影響。由此可以推知我國在唐代宗以前，就已經知道印刷的方法了。然而我國現存的實物固然沒有早到第八世紀的，就是目下在前人的載籍中，所能覓到可以確認為有關印刷的記載，也要比百萬塔陀羅尼咒晚五十多年。因之我國印刷術究竟起源於何時，成爲中外學者多年來研究的對象。近年有些學者或主張始於唐玄宗時，或說始

於唐太宗時，或謂始於隋代，雖然不是沒有可能，但他們所提出的證據，都還薄弱得很，不能成立。因之我國印刷術發明的時期問題，現下還沒有得到結論，仍有待我們來繼續研究。

我認為我國印刷術的發明，似以受佛教的影響比較大。六朝以來，佛教昌盛，信徒們為了積功德，往往雕刻佛像或抄寫佛經來施捨於人。據當時高僧的傳記中記載，那時的人抄寫相同的佛經動輒以千百份計，在這樣的情形下，自然很容易想到如何用複製的方法來代替重複抄寫。又據記載玄奘法師曾用紙印佛像施人，每年施捨的有五匹馬背負的那麼多。不過印佛像只是用木刻成佛像在紙上鈐蓋，有類於蓋印章，還不能說是印刷。然而這種複製的方法，予人的啓示作用很大，很容易轉變成雕版印刷，來複印佛經。我相信在初唐或盛唐時期佛教的典籍中，可能有這類的資料存在，只是有待我們去發掘。還有近幾十年在敦煌及新疆考古發見的遺物中有許多佛教印刷品，沒有刊版的年代，如日本中村不折收藏有一卷在吐魯蕃所發現的古刻本妙法蓮華經殘卷，文中雜用武則天所造的異體字，可能是距武后不久所刻的。像這一類無刊印年代的古刻本，也需要我們來研究考訂它們的年代，其中可能有最早期的印刷品。

從明萬曆以後到清初這約一百年間，是我國書坊刻書最盛的時期。若從純藝術的觀點來衡量，也是我國雕版印刷技術最精美的時代。在這一時期中的蘇州、杭州、以及南京書坊林立，彼此間為了爭奇鬪勝，多用重金聘請繪雕的名工來從事。當時的公私刻書，很多可能是由他們承包的。書中附刻插圖，以這一時期的印品最生動精美，顏色套印也以這一時期最普遍，由朱墨兩色遞增至四色五色套印，像崇禎時金陵十竹齋彩色套印的十竹齋畫譜，可以稱得上曠絕古今。這一時期應該是我國版刻史上相當重要的一頁，然而在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及以後撰中國雕版源流的都予以從略。固然是明末坊刻不受

清代藏書家的重視，也是他們所刻的以傳奇雜劇、章回小說為主，在乾嘉以來樸學氣氛籠罩下，而鮮流傳的緣故。近幾十年來戲劇小說的研究考證蔚成風氣，明代刻本也成為公私購藏的對象，往日不為人知的書，多重顯於世。近代雖也有研究套版、版畫的，但成績並不甚著。至於如那時書坊的情形，各書坊間的關係，版畫繪雕工何以多安徽人？他們的生平及在藝術界的地位如何等問題，則還乏人研究。這一頁歷史，尚有待我們來補寫。

多年來常有朋友及出版界與我談起某某書以那些版本比較好，以我國古代圖書的浩瀚，而每一書流傳的本子又衆多，我相信這一個問題不是任何一位版本目錄學家或校勘學家所能完全解答的。我國關於概述各書的內容及著者生平像四庫總目一類解題的書，前人著作的比較多。而對於論析各書流傳版本的源流與異同這一類的參考書，則罕有纂著。像邵懿辰的四庫簡目標注，莫友芝的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張之洞的書目答問、葉德輝的四庫全書版本考等著作，雖然在各書下縷列許多流傳的版本，但都沒有條析各本的淵源如何，及究竟這些本子有無異同。讀書之必需選擇版本，這個道理，差不多凡是讀書的人都知道。因為一部書因本子的不同，其內容往往有很大的差異。譬如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現在流傳的有明刻說郭、學海類編、歷代詩話，知不足齋叢書、湖北先正遺書等叢刻本，都是一卷，僅從各本的卷帙是分辨不出它們有什麼不同，而實際上內容有很大的出入。說郭學海類編本凡三十五條，歷代詩話本出於說郭，只是又少一條。而知不足齋本是根據明洪武時華亭孫道明寫本翻刻的，共六十九條。不僅條數比說郭等本多出一倍，各條的文句也比說郭本為詳，湖北先正遺書本即從知不足齋本翻刻。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現今流傳的明清屢次刻本都是十六卷，四庫即據以著錄。此書在日本曾翻刻過，日本寬文二年刻本，分為天地人三集，每集六卷，共十八卷。其本比十六卷本多出四十

一錄，另有幾條要比十六卷本多幾十字至二百餘字不等。寬文本是據明萬曆黃貞升本翻刻，黃本則出元代抄本。黃本今已無傳，尚幸有日本翻本，才能使我們見到此書的本來面目。如葛洪的神仙傳，現傳有三種不同的本子，一種是道藏本與汲古閣本，皆十卷，收八十四人，是為原本；一是漢魏叢書本，也為十卷，收九十二人，實係從太平廣記錄出編成，頗有謬誤；一為夷門廣牘本，則出說郛節本。如楊齊賢、蕭士贇注李太白詩集，四部叢刊所影印的明嘉靖郭雲鵬寶善堂本，就不如正德或萬曆刻本好，自然更不及元代刻本，因為郭本將楊蕭的注文刪削了許多。古書不加比勘是無法知道它的差異的。

清顧千里嘗說：「書以彌古為彌善」。書每經過一次翻刻，或因校勘不慎，或因故意的改竄，自然沒有早期的刻本好，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論。有的書雖然刻印的時代較後，但他根據的本子要比流傳的刻本更早而好，所以這個刻本也往往勝過比它早的刻本。如世說新語，現在存世最早的刻本是宋寶慶本，稍後是元代坊刻本，然此書最善的本子却是明嘉靖時袁褫嘉趣堂刻本。因為現存的宋元本將劉孝標的注文有些刪節，而嘉趣堂本是據宋陸游本覆刻，注文未刪的緣故。又如水經注一書，清代的武英殿聚珍本，及全祖望、趙一清等刻本，都要比明代的幾次刻本好，因為他們曾根據永樂大典來校勘，補脫、刪妄、正誤了七千多字。清代的學者對於校勘學的貢獻很大，所以有些書清代的刻本，往往要勝過元明本。假如我們不了解傳本內容的異同，及翻雕的源流，是無法來抉擇好壞的。

六年前，我撰寫說郛考，將說郛所收的幾百種書，曾取流傳的各種本子來對勘，並參考各家的書志，撰成說郛書目考，縷述每書的源流及傳本的異同。這個工作，有些朋友認為還有點參考的價值。因此使我想到假如能將這項工作推廣，將四庫所著錄的書或明以前人的著作，都仿這種方式而更加詳細敘述傳本的源流與異同，這樣的一部參考書，對於作研究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幫助。當然，像這



樣一部鉅製的編纂，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只要我們有志研究版本目錄學者有決心，再能獲得學術團體的協助，終必可以完成的。

謝識：這篇原來是應書目季刊編者之約而寫的，發表於該刊創刊號上。本校圖書館學會準備出版學刊，負責同應來向我索稿，倉促間無以為應，因想起此文原係對有興趣版本目錄的青年朋友而談，正是本刊發行的對象。乃將原文略加刪改，以省篇幅，交由本刊刊登。承書目季刊負責人惠允轉載，謹致謝忱。——筆者

### 韓國光州盤谷寺達摩經的新發現

去年十月在韓國光州盤谷寺內的一個寶塔的石穴中，發現了由十二張紙粘成一卷的雕印本達摩經，是新羅和尚彌陀仙用漢文翻譯的。彌陀仙在唐高宗永隆元年至武則天長安四年（西元六八〇至七〇四）曾在我國長安留學。經韓國學者的考證，此盤谷寺是西元七五一年所建造，則此塔的造成及所貯佛經的雕印當也在此時。如果鑒定無誤的話，則此達摩經約雕印於八世紀中葉，比日本印陀羅尼咒還要早一二十年。

##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新館舍即將落成

七六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新館舍，位置在臺北市中正路新生南路口轉角處，是西式四層鋼筋混凝土大樓。其外貌為一長方形，東西長四五公尺，南北長三〇公尺，佔地面積共一、三二〇平方公尺，館舍全部空間共五、二八〇平方公尺。高度第一層三、三公尺，第二至第四層每層三公尺。正門面向中正路，進門大廳後為公用扶梯，直通各層，各層的配置預定如左：

第一層為問訊服務層 (Information Floor)。進門為大廳，大廳左方為輕鬆閱覽室 (Browsing Room) 與參考閱覽室；右方期刊閱覽室；後面為參考人員辦公室、問訊服務臺及書庫；最後一排為辦公室，包括採編組、總務組、館長室、主計室、人事室、會議室、管理人員室及廁所。

第二層為大眾教育層 (Education Floor)。左方為兒童閱覽室；前方為青少年閱覽室；後方為普通閱覽室、休息室及廁所；右方為公用目錄室、出納臺、書庫及閱覽組辦公室。

第三層為分科研究層 (Research Floor)。左方為臺灣資料閱覽室；前方為文史閱覽室及科學與技術閱覽室；後方為裝訂室、研究室 (十小間)、南洋資料閱覽室；右方為書庫。

第四層為休閒活動層 (Recreation Floor)。左方為輔導組辦公室、唱片音樂室、美術閱覽室、前方為聚會堂、放映室；後方為巡迴圖書車書庫、討論室教室 (二間) 及廁所；右方為畫廊及書庫。

新館舍完成後，不僅可將該館所藏中西日文三十餘萬圖書全部移入庋藏，可供一、〇七〇讀者同時閱讀，且可開展問訊、教育、研究、休閒、推廣等各種活動，使其成為臺北市民眾活動的一大中心。